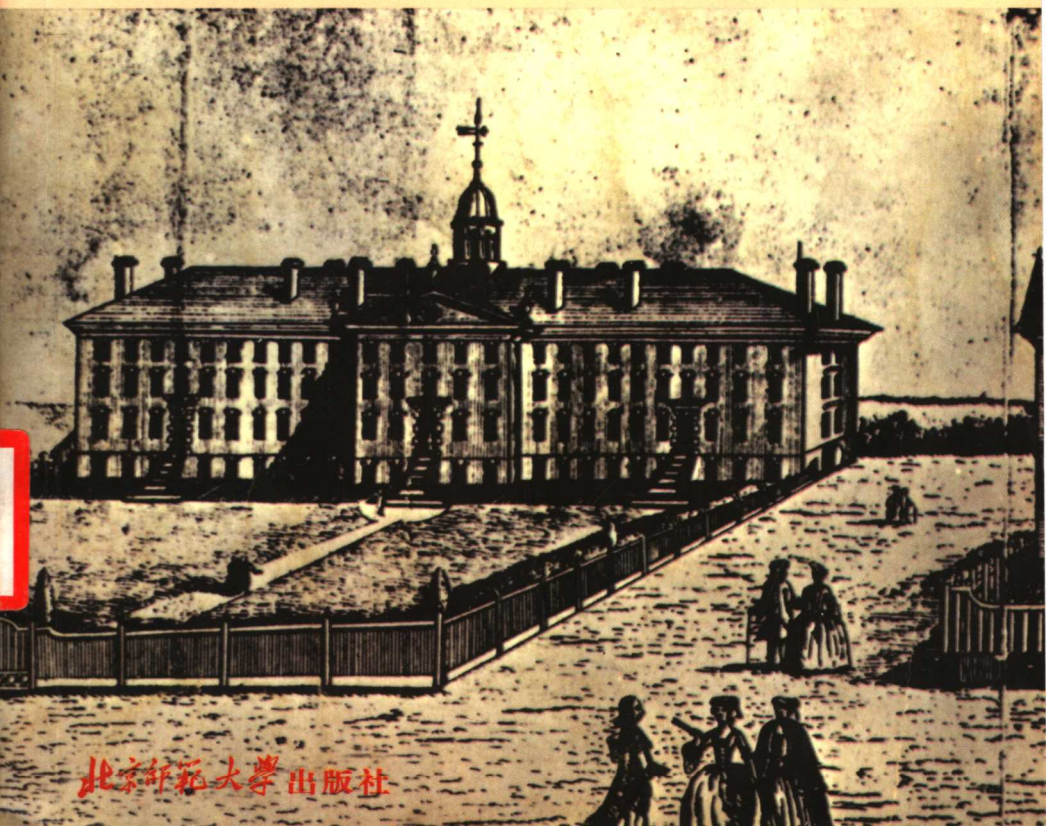


美国教育史

AMERICAN EDUCATION

城市化时期的历程 1876-1980

[美]劳伦斯·A·克雷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教育史

(三)

城市化时期的历程 (1876~1980)

[美] 劳伦斯·A·克雷明 著

朱旭东 王保星 张 驰
占盛丽 陈 璞 蒋 衡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教育史.3,城市化时期的历程/(美)克雷明著;
朱旭东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3-06506-7

I. 美… II. ①克…②朱… III. 教育史-美国
IV. G5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215 号

本书经美国新闻署授权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4 字数:595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前 言

本卷是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上承《美国教育史：殖民地时期的历史，1607—1783》（纽约哈珀·罗，1970年版）和《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1783—1876》（纽约，哈珀·罗，1980）。在这三卷中，我尝试从学术的角度对美国教育史进行全面的论述。第一卷将美国教育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叙述了十七、十八世纪作为殖民化内容之一的教育结构在新大陆的移植，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演变以及在美国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卷的叙述截止1876年，描述了美国本土教育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常用词“派地亚”^⑥及其含义——福音派教徒的虔诚、民主的希望和功利主义的奋斗精神，同时指出了它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成了美国社会的统一，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内部冲突造成美国社会的分化。本卷论至1980年，重点放在美国社会城市化过程中教育在体制上的转型和数量上的激增，阐述了美国文化和文明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这些教育体制和教育机构所起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本卷说明了民族宗教构造是如何导致美国“派地亚”在本质和特征上的基本变化；追溯了进步主义改革在大中学校空前的扩展和一大批教育性社会服务机构建立过程中的改革的作用。本卷还描述了作为公众教育（以及误教育）重要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体的产生；记载了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由主要以监督性为主兼有辅助教育功能向真正的

^⑥ paideia 是一个希腊词，其意思是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后来的拉丁文 Humanitas 继承了它的意思。——译者注

教育结构的转变；描绘了农业、工业和军事中教育性工作的转型，从只在短期内影响一小部分工人的非正规学徒性工作，转变到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数百万工人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还描述了传教士、商人、慈善家和政治官员将美国教育性机构移植到海外的各种方式，当然其中不乏各种具有讽刺意味结果的出现。本卷正是在所有这些变革中揭示了大众化、多样化、政治化成为美国教育主要特点的多方面原因，并指出其中一些最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是导致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根源。

在前两卷，我从广义上把教育定义为传授、启发或获得知识、价值观、技能和鉴赏力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有目的、系统的持久努力，以及通过其他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所进行的任何学习。这一定义意在引起人们对多年来使教育得以发展的各种环境和机构的关注。我同时特别关注 20 世纪美国教育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大中小学和大众传播媒介日益突显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个人与这些结构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公共教育》（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76）一书提出了所有这些变化的一般原理。正如在前两卷中一样，我对教育思想也给予实质性的关注：不是将这些教育思想看作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或仅仅是对现实存在的理性化解释，而是将它们看作在某一社会背景下的各种推动力量。这些推动力量为赢得社会的关注而竞争，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理想的和可行的教育观。同时我还从更宽广的视角探讨了这些教育结构；当然我们也应该牢记：虽然 20 世纪的教育结构更加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个人仍旧可以遵循自己的安排、自己的观念和自己独特的追求，通过这些教育结构走自己的路。最后，我一直尽力避免出现与 1973 年辉格党派和额外基金有关联的过失，使做出的努力不至于白费。我有幸再一次感谢联合会、办公室（现在改称为部门）和集团公司给予我的真诚帮助，使我能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本书存在什么问题，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尤其是麦瑟斯·霍尔特先生、凯佩尔先生、加德纳先生和皮弗先生。

任何一位从事综合学术工作的人都能知道，这项事业进展过程中的每一点一滴进步都需要有来自各方的、无限的友好帮助。国内外许多研究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耐心而慷慨地为我们付出他们的时间，展现他们的业务能力；他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无名英雄。此外，我在写作过程中很幸运地得到一批才能卓越的研究助手的帮助。凯瑟琳·奥布赖恩·波多纳罗为研究华盛顿·格莱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玛丽·安·道布克和萨拉·亨利·莱德曼帮助我处理第十三章中一些教育传记，玛丽·安·道布克还在其他几章的资料查寻和注脚校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埃伦·康德利夫·拉吉曼是我过去十年共同执教的搭档，她与我一起合作完成了第二卷的大部分工作，从结构框架的确定到主要观点内容的提出，在每方面她都给予了无尽的帮助；同时她还全面阅读了最后一稿并提出批评意见。编辑小卡斯·坎菲尔德在耐心和鼓励人方面堪称典范，从一开始他就以饱满的热情参与这一课题，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与他的智慧密不可分。南茜·费尔南德兹以耐心和认真的态度将原稿打印成册。本书不论将获得多大的成绩，都将属于帮助我完成此书的诸公；而本书的不足之处则应完全由我来承担。

本卷的写作始于1980年夏天，当时我住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后来在该中心（1981年的夏天）、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82年和1983年的夏天）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写作。另外，1984~1985年我作为院长访问者在高级研究学院度过了极其充实的一年。我要感谢在我居住期间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加德纳·林赛和斯坦福教育学院院长J·迈伦·阿特金以及1984~1985年间高级学院院长哈里·伍尔夫给予我的热情款待和提供的大量帮助。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从该课题一开始就给予我帮助，在

此，我衷心地感谢学院教师和学生、同事一直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慷慨帮助，使我有机会在1976年的墨尔·柯蒂讲座上阐述本卷的主要观点，后来这些讲演都收录在《美国教育传统》（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77）中出版。

我敬爱的父母亲在本卷的写作过程中去世了。他们阅读了我发表的每一个词，使我不至发表本不应该出版社的文章；他们慈爱地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指出他们认为可欣赏之处和改进之处。过去几年中，虽然我从一名教育者的角度通过历史资料和现实的研究对家庭有了详细的了解，但我从他们作为父母培养、支持和教育孩子的方式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

最后，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完成本卷的写作；他们的奉献和理解一直都是无穷尽的。再一次表示我无尽的感激之情。

劳伦斯·A·克雷明

1987年5月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目 录

前言

导论.....	(1)
---------	-----

第一部分 道德的国度

引言	(21)
第一章 现代主义的挑战	(23)
第二章 城市化时期的使命	(81)
第三章 多样性模式.....	(131)

第二部分 奋进的国家

引言.....	(171)
第四章 进步主义模式.....	(175)
第五章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241)
第六章 儿童保护和社会服务机构.....	(303)
第七章 大众传播媒介.....	(353)

第三部分 信息化社会

引言.....	(417)
第八章 知识的本质与用途.....	(421)
第九章 文化之所.....	(475)
第十章 工作之所.....	(523)

第四部分 都市教育

引言.....	(575)
第十一章 机构.....	(579)
第十二章 社会结构.....	(637)
第十三章 生活.....	(671)
第十四章 特征.....	(715)

导 论

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

——约翰·杜威

一

1876年美国人民庆祝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的心情是复杂而奇特的，他们既骄傲自豪又羞愧愤慨。当时面临无可回避的现实是：国家经济危机困扰，政府丑闻缠身，对南部各州的军事包围依旧，军队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仍在继续，新获解放的黑人既无选举权又无识字能力，一些能言善辩的妇女为争取获得公正、平等和“美国公民享有的一切民主政治权利”也选择7月4日来公布她们的《妇女权利宣告》。然而，在费城举行的、有五分之一国民参加的大型展览会又同时充满自信地宣告了美国在世界工业界的领先地位，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士气；在百年国庆之际，赞颂独立战争的胜利及自治成果的豪言壮语汹涌而来甚是鼓舞人心；与此同时，更多的人相信格兰特主义将被抛在身后，国家将走上一条道德回归路。¹

通常传教士会把这一切当作上帝对他所选择的子民予以特殊关照的一贯表现。自由主义部长霍勒斯·布什内尔认为真正“国

家”的形成和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独立宣言》的颁布，即从政治上确认了在精神上早已存在的国家。其次是《宪法》的起草，即将“由万能的主早已按照祖国历史发展模型建构出的宪法”在内容上具体化。第三是要在内战的烽火中考验“我们神圣英勇而又注定具有悲剧色彩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上帝公正的立场使人们摒弃了积怨、憎恨和永怀在心的嫉妒，民族性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布什内尔宣称，美国现在可以自由地扮演它在历史发展中千年王国的角色；这使共和国仍然能在国家生活中显示其对上帝榜样的忠诚，并以此“接受世界各地的观点”和“指挥本国的运动”。²

尽管布什内尔的神学观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它所具有的代表性却是不容否认的。整整一代的新教神职人员都在向美国人民传播他们在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中所要承担的领导责任，而此时也正是实现该任务所需的资源开始出现的时候。目标与发展潜力之间的相互影响促成了国家下一个世纪许多方面的发展。其中发展的核心是城市化：美国在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的同时也向全世界输出了它的文化和文明。而教育则以其多样的模式和结构深层次地介入了这两个过程。

二

1876年以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仍然在扩展，人口的增加也丝毫没有减弱。1912年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加入确定了美国的大陆边界，而1959年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的加入则表明地理上的分离本质上不妨碍州的地位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在1876年以后加入的12个州都遵循了18世纪80年代首次制订的一系列土地法令，也就是说，希望加入联邦并在人口、

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达到特定标准的新地区在整个国家中并不处于次要的殖民地地位，相反，它们是在全面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基础上实现这一过程的。这些州的加入使美国的领土面积逐渐扩展到 350 万平方英里，纽约与火奴鲁鲁（即檀香山）间的距离达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一。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共和国，这也必然使它重新关注一些传统问题，即在追求自由社会的政治信仰下处理国家大小与自治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美国人口在数量上增加的同时也更加多元化。1876 年美国人口数为 46 107 000 人到 1980 年增加到 226 546 000 人。19 世纪后几十年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减缓；1900～1925 年保持相对的稳定；1925～1940 年又有所下降；1940～1960 年略有上升；1960 年后又开始下降。移民人数也随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但在 1876 年至 1980 年间大约有 40 000 000 移民迁入美国，形成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之一。不同时期移民的原居住地也各不相同。1880～1924 年期间以南欧、中欧和东欧的移民为主；20 世纪 30、40、50 年代主要是西北欧和中欧的移民，他们中许多是为躲避极权主义或战乱而到美国的逃难者；20 世纪 60 年代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加拿大、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的居民；70 年代移民的原居住地除了以上地区外还有南亚和东南亚各地区，其中许多也是极权主义或战乱国家的逃难者。

移民来源的多样性使得美国人口在民族、宗教信仰和种族的构成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多元化特点；围绕美国化和争取公民权利而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在共和国建立早期就初露端倪，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社会中谁有资格获得完全的成员身份？国家最初的政策主张出生公民权，

即只要在美国出生的人就具有美国国籍，相对放松了对移民的归化。然而，在种族和社会性别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很模糊和混乱。美国黑人在 1868 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颁布后就已获得了法律上的公民权。而事实上他们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还在为获得实际的全面公民权而斗争。美国土著居民在《1924 年公民法案》中获得了类似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也仍在努力争取实际的公民权。日裔美国公民从未享受过完全意义上的美国公民权，在二战过程还遭到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制裁，被限制在重新安迁的营地内。与男子类似妇女从一开始就享有公民权利，但即便以最乐观的态度，妇女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也很有限、很模糊的；直到 1920 年宪法第九条修正案正式颁布后才获得选举权；20 世纪 70、80 年代许多美国人仍觉得有必要重新修订宪法修正案，从而能彻底地保证妇女的平等权利。白种人移民也同样面临着长期存在的语言差异和文化认同问题——两者都与美国化的观念和归化的要求有关。美国社会应该接纳不讲英语的德国人、墨西哥人或越南人成为美国公民吗？是应该要求这些人学习英语，还是应该期望各公立私立机构适应他们多样化的语言需求？一旦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决定接受美国公民教育，所用的语言应该是英语还是他们的母语？几乎整个 20 世纪人们都在激烈地争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对涉及美国身份的本质和美国社会特征的更为广泛的基础性问题的探讨。

人口统计显示，1890 年 6300 万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约占 30%；1920 年 1.06 亿人中城市人口约占一半以上，1950 年 1.51 亿人中城市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而到 1980 年 2.27 亿人中城市人口达四分之三多。然而，美国城市化过程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人口统计所显示的事实，它还与导致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

纪在工业、交通和组织等领域革命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间充满活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全国铁路网的修建,这标志着美国实现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铁路网的建设之初只是把各个城市与其远郊区之间的短途铁路线(这些在后来都成了更为复杂的主干线的分支)相联结;接着便将各城市间的铁路线连接贯通,在国家的某个地区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全国性铁路网的修建降低了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费用,也扩大了市场的开发潜力,从而刺激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所需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同样,这反过来也使资金的积累成为可能,形成了像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这样的大型金融中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电子、化学和信息工业的发展,这些金融中心也成为发展新的服务和知识经济的枢纽。当然,应当指出的是,随着运输和通讯的持续发展,新兴工业对繁重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依赖性不强,因此它们的发展也更为“自由自在”。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产生了电车、电梯、电话、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使城市可能发展到原先无法想像的巨大规模,同时大型行政机构也相继出现,便于管理城市中大量的服务业和维持城市经济所需的集团生产模式。

早期城市化的结果表现为中心城市与其周围郊区和远郊乡村间建立的复杂关系,随后产生了各种高度专门化的城区市郊混合体,这些混合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传统的“城市”、“郊区”、“乡村”的区别逐渐模糊直至消失。其结果便是形成了在人口统计中由于其规模和面积之大且容易辨识的大都市。后来,不同类型的大城区间自动地组成各种复杂的合作关系,首先形成的是大型区域性大城市集团,到最后出现了由大城市和大城市集团组成的网络体系,构成了二战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早在1880年——比创造了“更大的纽约”的政治联

合的出现早了将近 20 年,人口统计局就把纽约作为一个大都市区,将纽约城及其郊区的数据单列一部分以区别于其他城市。30 年之后的 1910 年,人口统计局将大城区的概念扩大到全国,将拥有 200 000 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及其郊区统称为大城区,并确定了 20 个这样的城区集合。城市的规模大小不等,有面积 44 000 公顷、人口 215 000 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也有占地 617 000 公顷、人口 6 500 000 的纽约市。40 年之后,即 1950 年,该局将这一概念改为“标准都市区域”(即后来的“标准都市统计区域”,将拥有 50 000 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一个或一组相邻县(在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城镇)统称为“标准都市区域”,并在全国确定了 168 个这样的区域。1960 年人口统计局又确定了一种称为“标准联合区域”的分类(即后来的“标准联合统计区域”),一个“标准联合区域”包括几个相互毗邻的、在社会和经济上相互融合的“标准都市区域”。1961 年,地理学家金·戈特曼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特大城市的兴建:城市化的美国东北部海滨》。金·戈特曼在研究了从南部新罕布什尔到北部的弗吉尼亚、从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脚的大都市区域之后,认为该地区是一个超越包括纽约在内的任何特定城市界线的生态整体。在这个“大城区”中不仅城市、郊区、农村的差别消失了,连城市间的差别也没有了。该地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旨在达到这种规模、这种流动和实现相互间的依靠关系,从而超越传统上的城市、县和州的界线。另外,在包括从芝加哥到圣路易斯的中部地区和从圣弗朗西斯科到圣地亚哥的西海岸的大都市区域这一现象也不难发现。

大城市区域很容易从人口统计的角度加以确定,因为大都市区域都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也可以从占地面积的角度来确定,只不过要精确地划定其边界及确定划界的依据总

是有难度。然而,各大城市区域最终也正是通过协调一致地发挥其各方面的功能才对居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早在1922年,经济历史学家N·S·B·格拉斯就提出人们在确定一个大城区域人口或地区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标准,最初是把大城市区域作为经济的市场区域,接着是政治的行政单位、宗教的教会单位以及知识方面的文化单位。1933年,社会学家R·D·麦肯哲在《关于最近社会发展动态的赫伯特·胡佛主席委员会》中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城市化进程加快,政治上是新的地区性管理和规划实体产生的结果,经济上是机动车更多地利用不断扩大的高速公路体系的结果,文化上是无线电广播发展的结果。两位学者在分析的最后都提到,美国各个城市间的相互合作最终将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城市联合体,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到20世纪70、80年代,不管确定全国性城市联合体所选的角度是政治(仅一项联邦住房项目就能推动整个美国郊区的发展)、经济(东北部城区的城市所消费的食品大部分是从美国的其他地方或国外进口)还是文化(6000万美国人能够同时收看到相同的电视节目),这种城市联合体已是无处不在。当然,城区间的主要差异也是不容否定的;底特律的汽车、阿克郎的橡胶轮胎和匹兹堡的钢铁仍然是各个城市的特色。另外,华盛顿还是行政中心,纽约依旧是金融业的首府。但是,不断加强的全国城区联合体间的依赖性和统一性已是既成的事实了。³

城市文明化进程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是深刻的。在最低限度上,这些要求将额外的负担置于现行的教育机构上,既坚持教育机构要向学生灌输对在拥挤条件下的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纪律,又建议教育机构应该向学生传授各种重要的专业知识。其结果将使对教育目的的表达也大大地扩展。因此,L·埃米特·霍

尔特向家庭推荐培养孩子具有坚韧意志和务实品质的抚养方式，即反复地向孩子灌输他认为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终身自我否定观念。华盛顿·格莱顿号召教堂将基督教的影响扩展到包括艺术、娱乐、商业、政治、工业和国际关系在内的所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部门。约翰·杜威号召把每所学校都建成“社会集团的雏形”，“积极参加反映更广泛社会生活的各种职业，并将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学科的精神渗透于其中”。同时，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结构，这样无私而沉着的专家群体就能用理性的探照灯启蒙公众。这些改革者预言由知公正而无私的专家培养出来的是具有责任心的公民，取代原来的具有优良品德、永恒爱国心和深谋远虑品质的自律者——这种关系将涉及各个人类活动领域中的任何机构，并最终将使大部分政治转成教育。杜威在他的教育纲领中坚持认为：“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所有的改革，如果只依靠法律的作用，或仅以某种惩罚威胁，或只借助机构和外部安排上的变动，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是无效的”。杜威和爱默生一样预见到了教育将在大范围内替代政治的那一天；然而杜威比爱默生更深刻，他还意识到在教育替代政治的过程中教育自身也要被政治化。⁴

教育的目的在所包含领域扩展的同时还提出掌握高度专业化知识技能的新要求。任何职业教育的支持者都希望把学徒制变为学校教育，以便为他们专业领域培养新的实践者打下基础——其推动力来自于以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制订为高潮的运动和职业学校的快速发展。《史密斯-休斯法案》确立了一些联邦资助项目，在高中传授农业、贸易与工业、家政学等学科，而快速发展的职业学校则与国立大专院校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更新了不同商业和专业领域现行的技能——西蒙·A·纳普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建立了一